

# 觀 察

·元千四售份每·

日八月三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期二第



卷二第

專 論

中國的政局

論黨的職業化

論教育政策

科學叢談

雞蛋直立的故事

戴文賽

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

台灣 (台北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週末關欄

婦女·女權

雷海宗

文 藝

聖誕夜

李慕白

觀察文摘

保障人權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

北平十三教授  
馬寅初

觀察漫畫·作者投書·編輯後記

撰稿人

蕭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傅 馮 馮 郭 郭 宜 宜 張 張 梁 梁 夏 夏 陳 陳 許 許 高 高 孫 孫 柳 柳 胡 胡 宗 宗 周 周 李 李 李 李 吳 吳 沈 沈 呂 呂 伍 伍 王 王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孝 希 有 移 東 沉 實 炎 癘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廉 彥 藩 宗 孟 絳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蔡 長 秋 德 竹 松 蔚 敷 寬 忌 適 華 亞 田 青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傅 馮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王  
錫 鏞 文 鍾 歐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新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寅 先 美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翰 芸  
翠 乾 銘 賽 書 川 欣 杰 且 嬰 超 複 剛 年 檢 蘭 以 銘 昌 紱 堂 吳 長 哲 遜 遠 初 盈 驪 林 郊 浹 培 霖 昌 信 萬 熾 生

撰稿人



### 讀報的困難

編者先生：在目前混亂的局勢之下，讀報真是困難。前年十二月林魯門總統的聲明被中央社刪改文句，曾經被尊編「客觀」重譯而對照出來。近來有沒有這類事，我不大留心，但昨日偶爾發現一事，特此奉告，不知貴刊能否刊布，以幫助留心時事者的深入了解？

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載駐延安的合衆社記者與朱德的談話，說到蘇聯問題。朱德說：「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爲一自由港，兩國中任何一國（蘇聯自然包括在內），可以駐軍。在該市只有中國警察可以維持秩序。」我當時看了很生氣，自由港是「任何一國」可以「駐軍」的嗎？別國可不在香港駐軍？

「Under the Sino-Russian Treaty, Dairen is a free port and there is no troops there from any countries, including Russia.」

原文是說：「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爲一自由港，而彼處現無任何一國駐軍，包括蘇聯在內。……」彼處現無任何一國駐軍，竟被譯爲「任何一國」可以「駐軍」，我先疑心大公報的譯員不與，後見文匯報也是如此，大概是合衆社送出來的中文稿就是如此。其目的無非暗示朱德沒有國家觀念，由衷願意斷送主權。以前只是中國的通訊社歪曲原文，現在則這份工作先在外國通訊社中就做好，您說讀報難不難？

同時我希望各報的編輯先生們要仔細一點，有原文可資對照的最好先校對一下，以免自誤誤人。

楊六章 二月廿五日 南京。

### 居正·司法的尊嚴

編輯先生：今日（二月廿五日）文匯報載：據二月十九日平津各報記載，二月十七日一夜，被捕者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前數日被捕者已達二千餘人。令人讀之，憤慨之至。最妙今天大公報的北平專電，司法院院長自京飛平，該報記者詢以北平捕人專事，居院長竟答：「無所聞」。又說：「如係事實，當然不合法」。北平非法捕人，鬧到天翻地覆，司法院的院長竟然表示一無所聞。居院長說過：「如係事實，當然不合法。」既然不合法，我們且看司法機關的下文吧。

許宏宇 二月廿五日 上海

### 宋子文的好作風

編輯先生：今天我一口氣讀完了貴刊二卷一期所刊傅孟真先生三篇批評宋子文院長的文章，好像大熱天落

了一陣暴雨，痛快痛快。不過我覺得宋院長也有幾點好的作風：第一，他平時很少參加不相干的公共集會，不像有些「要人」成爲公共集會的點綴品。第二，他從不發表令人作嘔的演說。第三，他無論到東到西，總是一下飛機就去辦公，不像有些「要人」要遊遊山玩玩水。本來一個負責國家大事責任的人，那兒有閒功夫去參加那些不相干的會？那兒可以隨便演說、胡說八道？那裏有時間遊山玩水？就這方面說，我覺得宋子文還有一點西洋政治家的味道。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張聿遠 三月一日 上海

### 傅孟真的文章

編者先生：今天讀了貴刊所刊傅孟真先生的文章，引起許多感想。不過這些感想與傅先生文中所論的內容，並無關係，我的感想是偏于言論權威一方面的。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夠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爲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決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程過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負得

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爲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的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爲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夠有十個「傅孟真」，挺着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致於像過去那樣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致於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真」，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

許金鏗 三月一日 上海

### 中共人員的撤退

編者足下：報載中共人員于日內自京滬渝一帶撤退，由美機分批運返延安。這是國民黨二十年來第一次的「漂亮行爲」。不過這個行爲能夠如此「漂亮」，恐怕和美國也有點關係。貴刊創刊就有王雲生先生的一篇論文，論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第一個去向就是「南北朝」，並說這「一個南北朝運動，是在有力的進行着」。今天重讀此文，感觸特多。中共人員的撤退，大有兩國絕交，下旗回國的味道。今天（三月三日）報載周恩來給蔣主席的信，信中所用「貴方」「我方」「閣下」的語氣，也顯然已是兩個國家，至少是兩個政府的語氣了。慘得很，慘得很。

梁華儀 三月三日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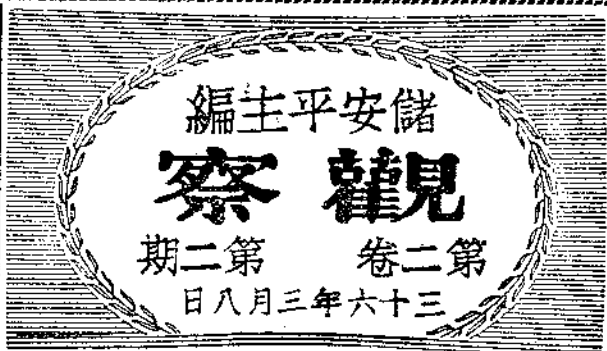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吳淞路四四四弄

本報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如有查詢，務請註明定單號碼。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樊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 蕭公權：四川大學教授
- 戴文樂：燕京大學教授
- 雷海宗：清華大學教授
- 李慕白：山東大學教授

# 中國的政局

儲安平

大局已到了窮則變的階段；雖未變出，確已窮極。

在最近幾個月中，南京的高級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自國民黨執政以來所未有的。這個變化就是：他們已深切感覺大勢之日非了。迫使他們心理上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多種的：馬歇爾的離華，共產黨的不妥協，一般輿論對於政府的抨擊，民心的渙散，經濟的崩潰，軍事上的沒有把握。南京顯已淪入黯淡與苦痛之中。

在國民黨的心目中，今日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黨。然而他們很少反省：今日共產黨勢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誰培植出來的。我們可以一一分析。先說青年。青年本來純潔，對於政治初無成見。祇要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一切上軌道，國家有前途，他們自然擁戴政府。但是政府種種表現，無不使人失望；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機。而還要花樣百出，「帽子」亂飛，無異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滑一色的厭惡南京政權的局面。再說中年人。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員、知識份子、工商界人。現在這一批人，一股腦兒都對南京政權沒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作風使自由思想份子深痛惡絕；抗戰以來對公教人員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員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的貪污作弊，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物怨氣冲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今日全中國人民，對於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現政權中的人，恐怕也未嘗不頓脚嘆息：爲什麼這些人都「左傾」了！假如不滿政府就是「左傾」，那末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種統治作風下，假如還不「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個大大的糊塗蟲。就思想左傾而言，思想左傾和信奉共產主義本爲兩事；思想左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產黨。但在共產黨與國民黨政爭之中，一切不滿現政權的情緒，其無異間接增漲共產黨的聲勢，確爲事實。共產黨是有組織的，一般人是沒有組織的，沒有組織的人之漸漸被有組織的人吸去，已爲事理之常，而當局還採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來愈和共產黨接近。不論這些不滿國民黨的份子和共產黨有無連繫，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產黨，總之在國共的鬥爭中，凡此皆對國民黨爲大不利。然而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今日國民黨腦子裏所想到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却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于共產黨的政治形勢。可是在這樣一個極爲明顯的大勢之下，現政權當讓不讓，可和不和，應改不改，要做不做，還是迷信武力，圖以武力解決一

切。不幸得復，現在已經開始感覺武力解決不了一切！武力磨滅不了病入膏肓的貪污風氣，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決的經濟危機，武力收拾不回痲痺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決定不了前線的戰局。美國軍火快用完了，日本軍火也維持不了好久，自己製造則遠水不救近火。雖然大帥出巡，而未必有補于士氣，因為將軍們都吃得飽飽的，而士兵們已無意為少數人送命了。

## 二

據我們觀察，現政權業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說，從抗戰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動攻勢，迄在反對派一面，特別是中共一面，國民黨始終處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國大開會前一兩個月，國民黨突然爭取主動，但國大一開，局勢大僵，最近喧染政府改組，鬧了幾個月也無甚成就。再說軍事，軍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蔣主席在中樞紀念週上論及臨沂之戰時說：「不管是共產黨自行撤退或國軍進攻，總之現已佔領」（二月十八日大公報），在過去蔣主席的演說中亦從無如此的語氣。經濟更是束手無策，上海的金價跳到九百六十萬，南京還在指派人員，組會研究。出口補貼，令甫十日，即行取銷，簡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拋售救濟物資，現政權的窮形極相，實已畢露。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由民選出來的政黨，為了顧全本黨的前途，稿不下時，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個以武力爭得政權的國家，一個執政黨，即使在最無辦法的時候，還是要掙扎維持其政權。掙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掙扎。在正路上掙扎，成敗另為一事，要亦不失為一種努力；若走錯了路，則所有的掙扎，都成爲了一種浪費和罪行。據我們的觀察，現政權的掙扎，顯然並未針對病源。舉例言之，現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組政府。但我們不知照現政權最近兩三月來努力改組政府的做法，這種改組，在政治上有何意義？還是想以此使國內人民一新耳目呢？還是爲了對友邦一種表示呢？在我們看來，目前這種改組，無甚意義。第一，要改組政府無非要刷新政治，振奮人心。那就得大公無私，唯賢是用。被延攬的人總要德才學望，能勝重任。可是現在政府所拉攏的是些什麼人？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聞也，有的根本在算盤子上沒有

地位。拉這些人入府，不足爲國民黨之助，反足爲國民黨之累；不足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誠，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偽。這是就改組論改組。第二，要使改組政府獲得成功，是有條件的，即必須同時改革政治作風。而在我們看來，改革政治，遠較改組政府爲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隨便換幾個部長，添幾個委員，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風。老實說，單替國民黨設想，國民黨果有決心打開當前的局面，振奮人心，則改組政府的自由進步份子。給他們權力，給他們機會，接受他們的觀點，接受他們的作風，全國耳目，也會一新。今日國人，深受「訓政」之賜，政治的經驗與政治的認識，確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訂建國大綱時所認爲那樣的簡單幼稚了，他們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變而是政治實質上的改變；何者爲假改革，何者爲真改革，他們洞若觀火，一目了然。但是事實上國民黨有無此種遠見，有無此種胸懷，有無此種決心，我們簡直懷疑。就說最近上海發生的勤工大樓血案，還不是一套老辦法？工商界人平時對於民主運動，本來不甚關心，處于旁觀地位，可是給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許多反對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權，一方面在北平大舉逮捕。我們別的且不說，就說蔣主席所提的四項諾言，若能兌現，人心亦可漸漸拉回過來。誠則靈，祇要國民黨有誠意，有決心，民心未嘗不可收拾。傳說當局對於目前局勢，非常明白，憂慮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覺悟而無行動，這種覺悟仍是屬於私人的，而無任何政治上的價值。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遠，要拉回來，須費大氣力，我們懷疑現政權的人物有沒有這大氣力。

## 三

共產黨是要獲取政權的。一個政黨當然要努力獲取政權；爭政權是一個政黨的常情，政黨不想爭取政權才是天下大荒唐。共產黨的堅主組織聯合政府，祇是他們的一個步驟，並非永遠滿足于這個聯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談判方式，插入政權階層，徐圖後舉，自然最好；否則祇好硬硬頭皮用武力來奪取。我們在原則是反對一個政黨善養軍隊，以武力來奪取政權

的；爲中國的元氣設想，我們也不希望共產黨採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這就是就理論而言。就事論事，共產黨的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爲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國民黨主張先軍隊國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共產黨則主張先政治民主化，然後軍隊國家化，各人的出發點都是由於雙方的猜疑，而雙方猜疑的根據則爲過去種種事實。在政協階段，共產黨表示願意還軍與國，但須得到保障，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連合在國府會議中取得否決權的背景（當時民盟力勸共產黨放下軍隊）。後來這個計劃固未實現，就是實現了，共產黨到底敢不敢交出軍隊，還是一個大疑問。

計劃中的聯合政府，至今未能實現。實在說，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了，參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發揮有效能的政治力量，還是一個問題。不過我們相當贊成成立這樣一個聯合政府。我們希望在這個聯合政府裏，發生一種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這個擬議中的聯合政府中，共產黨（即使聯合民盟）原祇是一個少數派，容能 *check*，未必能 *balance*。但因爲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堅強的黨，是一個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黨的政治計劃與政治作風的黨，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這個聯合政府中，或能發生一種領導作用。現在人民實在太窮太苦，政府應當推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藉以改善今日一般窮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國民黨成了維護既得利益階級的機構，要希望他能顧到一般低層人民的生活，不啻緣木求魚。我們希望共產黨參加聯合政府後，能在這方面有所作爲。一切社會主義的政策，其目的都在爲最廣大的窮苦人民造福，國民黨爲了要競爭人心，雖非所願，亦難固拒。共產黨最可怕的一點是統制思想。但共產黨既以爭「民主」爲號召，加入聯合政府後，必不致傾向統制，國共雙方且均欲盡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國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這兩樣東西在以國共兩黨爲主的聯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們期望這個聯合政府者在此。

在過去一年多的和談中，共產黨一直把持攻勢地位。他們一再要求和平。國共雙方對於「和平」究竟有無誠意？有人認爲國民黨是有誠意的，有人認爲共產黨是有誠意的。我們認爲國共兩方面根本就無所謂誠意不誠意。我認爲祇有「顧到自己，也顧到對方，更顧到國家」，這才算「誠

意」，專門替自己打算，都是爲私，絕不足以語「誠」。即以「和平」而論，以前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最近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有什麼不同？最妙的是雙方的主張停戰，據說都是爲了人民。既然共產黨的「無條件停戰」和國民黨的「就地停戰」沒有什麼不同，則爲什麼共產黨要求「無條件停戰」時，國民黨不接受，國民黨要求「就地停戰」時，共產黨不接受？原來停戰與張三有利時，張三即要求停戰；李四有利時，李四即要求停戰。一切都是爲了自己，老百姓祇是他們的幌子。現在我們看得很明白，共產黨對於「和平」是越來越不發生興趣了！要和平，從前是「無條件」的，現在是有條件的了；或者從前的條件低，現在的條件就高了；從前共產黨反對美國調解，主張美蘇英根據莫斯科三國宣言共同調解，可是現在，共產黨宣言反對任何外國的調解了（二月二十二日合衆社延安電：周恩來談話）。在過去和談一年中，在共產黨自身看來，他們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來氏返延後提出的和談兩前提，他們又何嘗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無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馬歇爾和南京方面難過難過而已。共產黨是現實的，所提和談的前提，在我們看來，也祇是一種幌子。即以國大及國大通過的憲法而論，周恩來氏既然同意由滬去京，至少表示共產黨有一種「有條件的」參加國大的可能。假如共產黨參加國大，通過的憲法其內容容有變更，但共產黨之不參加國大，並非爲了憲草，而是爲了憲草以外的其他條件沒有講好。要是講好了，還不是可以參加國大？而且去冬國大之所以開得成，也是因爲政協承認了那批舊代表的原故。要知道這批舊代表，本無承認之理，但絕無承認之理者，政協那些代表們也居然承認了——祇要自己的黨得到利益，犧牲人民亦竟不顧！去冬國大之能開得成，至少與政協的承認這批舊代表有關。而關於這點，共產黨也是同負其責的。老實說，憲法不憲法，共產黨並無太大的興趣，共產黨真正的興趣，還是在軍隊和地盤兩者之上。就軍隊論，他們顯然不願再接受過去整軍協議中所規定的國共軍隊的比例了。就地盤論，他們有他們的價錢。他們在過去至少希望得到四個地方，這四個地方要具有三個條件：第一，要能自給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連爲一氣。不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地點，他們不要。那四個地方，他們不說，但是照上開三個條件，似乎是指出東、河北、山西、陝西四省。然

而要南京給他們這四個省，在南京看來，這不要南京的命了。

#### 四

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黨。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住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對於共產黨的內情，我們自承所知不多，我們暫時祇能根據常識來說。近幾年來，外間對於中共在延安邊區一帶的作風，頗有好評。共產黨在這樣一種艱困的環境內，能站得住，亦自有他們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個政黨當他在艱困奮鬥的時候，總有一股朝氣和生命的力量。不過上年他們在蘇北一帶的作風，却大失人望。蘇北的作風，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變了呢？還是中共在延安一帶是一種做法，在蘇北這一類地帶又是一種做法呢？還是蘇北一帶的作風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級幹部幹出來的呢？我們未能瞭解。但是中共必須認識，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共產黨。他的黨員是中國人，他所企圖起而統治的一個國家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民性，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完全不顧他們所屬于的這一個國家的民性傳統，必將減少他們成功的希望而拉長他們離開成功的距離。社會主義是一個極其廣泛籠統的名詞，就經濟生活方面言之，共產主義祇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其間祇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而已。就實行社會主義而言，今日中國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知識份子，並不反對，毋甯說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識份子，在共產黨心目下，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今日中國的知識階級，除了極少數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淪為「無產階級」了。這是國民黨的恩賜！知識階級的領導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個不是已經到了雖然尚未餓死而早已不能吃飽的局面！而且知識階級，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數自私份子外，那一個不承認貧富的懸殊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所以共產黨在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則，並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眞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祇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有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種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點論，譬如說我們這批自由份子，不諱言，都是受英美傳統的自由思想影響的，但我們一樣批評英美，抨擊英美。同時，蘇聯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們一樣稱頌他們的好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見共產黨批評史大林或蘇聯？從來沒有看到左派的報紙批評毛澤東或延安？難道史大林和毛澤東都聖中之聖，竟無可以批評之處？難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圓滿得一無可以評論的地方？就後一點說，我們雖非共產黨員，但一樣尊重共產黨的黨員，祇要他確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義，忠于他的黨，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業，我們都在心底裏對他尊敬。但是共產黨的對人，祇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爲出發，不存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擺脫現實政治和張君勱先生的脫離民盟，也多少與共產黨這種極端作風有關。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前年英國工黨競選勝利以後，我替東方雜誌寫過一篇文章，結論說：假如英國工黨執政成功，則使世人明白，實行社會主義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線。英國工黨一方面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但同時仍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產黨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寬其尺度，則將更能增加他們獲得成功的希望。我們對於共產黨，私人方面無怨無恨，我這一番意見，我並不認爲僅僅是一種消極性的批評，毋甯說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議。

## 五

現在再來觀察國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份子。「自由思想份子」這個名詞，本來是很籠統的。若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則中國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都可以說是自由思想份子。若以政黨為別，則不僅國民黨中很有一些開明進步的自由思想份子，就是在共產黨中，恐怕也有這種份子。馬歇爾的聲明中曾抨擊過共產黨裏的極端份子。按照邏輯說來，根據馬歇爾的聲明，則共產黨中也是有溫和的自由份子的。據我們所知，恐是有的，問題是數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種嚴密的黨紀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論述政治形勢的文字，所以我們在此討論「自由思想份子」，大體上係指國共兩黨以外的自由份子而言。在中國，散佈于國共以外的自由思想份子，為數極多，不過他們較為散漫，甚少嚴密的組織。其中組織較大的就是民盟。我們現在先就民盟作一個大概的論述。我們可以拿兩句話來批評民盟，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民盟是一個很勉強集合而成的政團，民盟裏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歷史環境，他們祇是在一個相同的情緒下集合起來的，就是「反對國民黨」，這是他們唯一連繫的心理中心。民盟倒底是一種政黨的做法，還是一種運動的做法呢？就過去情形觀之，似屬于後者而非屬于前者。民盟的歷史已有數年，而其出頭則為前年的政協時期。不過在過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種印象，即政府來借重他們時，有了「民盟」，不來借重他們時，就沒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談」，民盟就大大熱鬧，沒有「和談」，民盟就冷清清的無事可做；這情形至少在過去是如此。照近來的趨勢看，他們似已企圖改向政黨的做法一途發展。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味道本來還很重，民盟的領導人物還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輩。我們若將民盟的領導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個政團是非常脆弱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像張表方（瀾）、沈衡山（鈞儒）等幾位老先生，實在都是過去的人物了。民盟領導人物中實際以治經驗最豐富的當推黃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說，黃先生也是過去的人物了。張君勱先生（現已脫離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個憲政學者，一個最好的政論家，然而他祇是一個論政的人，而不是一個從政的人物，他至多祇宜于任國會議員，而不宜于掌行政

責任。張東蓀先生也不適宜從事實際的政治生活，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貢獻的還是在思想及言論方面。若以現代的標準言之，嚴格說來，在今日民盟的領導人物中，適宜于實際政治生活者，恐怕祇有羅務生（隆基）先生一人。羅氏中英文都好，口才文筆都來，有煽動力，有活動力，而且對於政治生活真正有興趣。可惜羅氏的最大弱點是德不濟才。從各方面分析，民盟實是一個貌合神離的團體，而所以能勉強集合起來，完全是由于實際的政治環境逼成的。但單靠對國民黨的一種不滿情緒來維繫一個政團，這顯然是一種極其脆弱的結合。照我個人的觀察，民盟諸君子，可以共患難，不一定能共富貴。這句話或許說得太率直，我們將來再看吧。

至于現在一般人都說民盟太左，成為了共產黨的尾巴，關於這種批評，我認為無甚價值。凡是進步的政治集團，當然是比較左的；世界大勢如此。成為了共產黨尾巴一點，純然是惡意的侮蔑。要知實際政治不能完全擺脫權術，從戰略上說，民盟和共產黨互為呼應，實為必然，兩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國民黨，在這個前提下，兩者當然要並行連繫的。假如一定要說如此就是民盟被共產黨利用，則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民盟也利用了共產黨。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為民盟之病。祇要國民黨一日保持其政權上的優勢，民盟與中共可能繼續維持其連繫的步調。但是一旦國民黨在政權上已不佔優勢時，在那個時候，中共與民盟恐將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應了。

## 六

在今日中國的自由份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黨這些組織外，就是散佈在各大學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份子了。這批自由思想份子，數量很大，質亦不弱，但是很散漫，從無足以重視的組織。這批人所擁有的力量，祇是一種潛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祇是一種道德權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權力的力量；祇是一種限於思想影響和言論影響的力量，而非一種政治行動的力量。馬歇爾在中國時，曾竭力鼓勵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份子組織起來；無論馬歇爾如何瞭解中國的政治情形，馬歇爾到頭還是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國頭腦，所以他還是隔一層的。自由思想份子不易形

成一個堅強的組織有各種原因：一、過去自由思想份子的彼此相通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份子的長處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長，其短處則為胸度狹窄，個人主義。中國有句話：「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自由思想份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都受過現代文化的洗禮，但那個「相輕」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脫。譬如這次民社黨和民盟的脫離，政治上的看法固為主要的因素，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事政治，必須有政治家的修養。第一要看得遠，認得清；大的要爭，小的就不該爭。第二要有氣量，唯氣量大，才能放棄自己的成見，抑平自己的感情，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顧全大局，爭取目的，團結合作，開創前途。政治活動不能沒有領導人物，但是因為「相輕」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份子中很難產生領導人物；政治活動是必須有組織和紀律的，但是因為自由份子的相通大都是道義的，不是權力的，所以很不容易發揮組織的力量。這些是自由份子根本上的弱點。二、今日中國極其需要自由份子的抬頭，但事實上自由份子的抬頭非常困難，這與國民黨二十年來的統制有關。國民黨二十年來的統制對於自由思想份子的抬頭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這點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釋。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談不到。2. 經濟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動必須有充裕的時閒和財力，八年抗戰，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個個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們在政治方面所能發揮的積極力量。3. 在思想散佈方面的限制。二十年來黨化教育的結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黨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義，做國民黨的孝子順孫，不料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越搞越不像樣，弄到青年大都厭惡國民黨。厭惡國民黨不要緊，黨化教育給青年的並不是一種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應有的教化，於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滿實現而日益泛濫。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須在理性上有修養，始能接受自由主義的薰陶。情感泛濫的結果是趨于極點，不是極點的右就是極點的左。但現實環境逼得青年左，於是青年越來越不易保持其冷靜的頭腦而對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國民黨，可謂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義的傳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時，黨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羅奴才，放任浪才，殺害人才，毀

那些祇知享樂百事不管的青年為浪才。浪才越多，對於自由主義的傳播也是一種限制。自由主義是鼓譟是非的，那些浪才什麼都不管，那邊管什麼是非呢？

自由思想份子雖然受着上述種種限制，而客觀地說，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長之中。但我們還不能將這種力量的滋長歸之于他們的努力，而實係由于時代的使然。若從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則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因為大家怕共產黨，怕他們那一套殺人放火的暴行；無論這種畏懼是不是出于一種誤會，總之大家在畏懼共產黨。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國民黨的腐化已是眾目昭彰，有口皆碑，無論三民主義這塊招牌如何，總之人民對於國民黨已難維持希望的信心。在這種兩極極端之下，祇有自由份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們說過，今日中國這批自由份子是很散漫的，他們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無形的，看不見，抓不着，但其所發生的力量，則深入而能垂久。這股力量在社會上有根，在人心裏有根。不過若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局面看，這種僅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顯然失之消極。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這個要求是時代逼出來的。我們認為中國在最近的幾年之內，一般情景還是很黯淡的；說得遠一點，則我們這一代，大概也已註定了一個「犧牲自己，為後代造福」的時代。然而我們可以犧牲自己，而不可以不為後代造福。今日中國這批自由思想份子，大都在苦悶地憂慮着國家的前途，但他們實不該止于消極的焦愁憂慮。自由思想份子可以起來，應該起來；這不是他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個歷史上的責任問題。

## 啓事

本社時接讀者來函，謂向其他書報業訂閱本刊，常常不能按期收到，要求本社代為催促。查既非直接向本社訂閱，本社事實上難於照辦，尚希鑒諒。以後各地讀者如欲不再有此類事件發生，務請直接向本社訂閱為荷！



# 論黨的職業化

吳世昌

要毀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最有效的辦法是使他腐化。使他腐化的方法也頗簡單，在精神方面是時常對他恭維吹噓。對人則用「偉大」、「聰明」、「能幹」、「賢明」，甚至「聖哲」、「英睿」這類不怕喪失自己身份的宇樣；對團體則用「偉大」、「堅強」、「完美」、「進步」，乃至「為國為民」，「為世界人類造福」一類不怕肉麻的宇樣。在物質方面是使他「不勞而獲」，或比別人少勞而多獲，兩種方法合起來，使他受催眠而忘其本來面目，真相相信自己偉大聰明，因而作威作福，保有並擴張既得權利，成為小團體或大團體中的特殊份子。許多大戶人家的不肖子孫都是這樣寵出來的。許多本來有希望的團體發展到某一程度即腐化消滅，也是被更大的團體「寵」壞的。

豈僅是個人或團體，有時連整個民族都可以用恭維和特權這兩套法寶來把它腐化而漸趨消滅。有一個恰好的例子，也正發生在我們這個有數千年精神文明的中國。試想三百年前滿人初入關時，是怎樣的年青茁壯而富於生命力的民族！在乾嘉時代，滿洲統治階級的文治武功，都還是第一流的。即在文藝方面，納爾性德的詞賦比號稱宗匠的朱彝尊高明得多。但是兩百多年的「聖文神武」、「懿德莊淑」和「皇糧」，把一個年青有為的民族腐化得只會提着烏籠吊嗓子，到今天連祖宗的姓也不要了，除了極少數才智之士，一般滿人都已否認自己是滿族！

其實這不過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中國歷史上差不多每一朝都是如此。開國之君照例是奮發有為的，傳一代或二代常常會產生了「惠帝」——一個低能兒的體面稱呼。至於旁支更不必說：漢景帝也算是「不壞的」，但我們讀讀「景十三王傳」，簡直令人懷疑有些王是人類還是獸類。這些歷史上的悲劇，我們不必替古人掉淚，可悲的是杜牧所謂「後人不暇自哀，而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推翻滿清的國民黨，在當年是何等抱負，何等精神！即在北伐時代，

也是朝氣蓬勃，人民望之如大旱之望雲霓，真有「南征則北怨，曰：『奚為後我？』」的感想。可是短短二十年的執政，中間還夾着一大半隨時應該警惕的外患時期，竟會腐化到今日的局面，這豈僅是國民黨的不幸？真令人懷疑到中國這民族有沒有復興的能力。看來前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只說對了底下的一半。

中國的一般老百姓覺得，國民黨雖然是一個革命的黨，但在北伐完成以後，和中國以前的換朝代並沒有大區別。因為既稱一個政黨的革命，則最重要的是「革」過去政府的政策之「命」。此點國民黨並未做到。她雖然有一套很好的主義，允許人民許多權利，却似乎準備藏諸名山，到今天也並未實施。不要說今日，即在抗戰以前，人民的實際生活並未比清末好多少。這正如同劉邦雖然答應人民除秦苛法，只有約法三章，而實際上劉邦本人並未履行諾言。「肉刑」一直到文帝時才廢止，「挾書之令」一直到武帝時才廢止。倒是過去換朝代的特點，「征服者的姿態」，却充分做到了。北伐軍一到北京，立刻改為北「平」，從此借鐵路之名：「平滬」、「平漢」、「平綏」，——若不是東北人反對，也有了「平遼」；四通八達，一律壓平了。其次是換國旗，改國歌，嚴正朝（胡適之先生在戰前曾說：政府幾年來似乎只以全力禁止人民用陰曆），大興土木，制禮作樂。而最重要的是國民黨自成為人民中的特殊階級，以人民的膏血來養黨，我想不出這與前清的「皇糧」有什麼不同。

八年抗戰使國民黨的政府十分艱苦，戰後問題頭緒紛繁，也算是個「憂患」之局。所以逼了半年，還逼出了一個差強人意的政治協商會議。但有些人回收復原狀一看，敵偽物資山積，美不勝「收」，人民頌揚勝利，渾身舒服，於是再來一次征服者的姿態，先把偽幣壓到二分之一，叫人民知道法幣的「價值」。然後五月還都，普天同慶。政協決議，撤在腦後了。凌夷至於今日的局面，其故雖然多端，而黨的職業化，却是其中很重要

的一個原因。

中國的黨（或團）的職業化，主要原因由於取得政權。一個政黨在野期間，它的經費或由支持該黨的富戶捐助，或向海外華僑募集，財力不甚充裕，因此也尚有奮鬥和求進步的精神。一旦取得政權，雖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利益則已成既得。或者當其未得政權之時，早存一朝權在手，便把財來發之心，或許鼓勵其部屬，懸為努力目標，也未可知，因為這也是我們的「特別國情」，由來已久。例如會國荃之打太平天國，則允許湘軍攻入南京後可以大搶，至今「打南京」一詞猶成爲某地「發財」之別名。奉直戰爭時，奉軍將領也答應士兵「打到關內吃大米」。不過那些都還是暫時的現象。只有多少年來有所謂「吃黨飯」這一現象，真是使國家貧窮的一大原因，使執政黨腐化的一大原因，也是使黨的利益永遠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因此也是使政治弄不好的一大原因。

現代的政治離不開黨，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如果照有的政治學者所說，政府是一個 Necessary Evil，則政黨似乎也是 Necessary Means to the Evil。不過現代世界各國的政治，不外一黨制與多黨制兩型。前者如今日之蘇聯，戰前的德、義，以及至今殘存的西班牙之類。後者如英、美、法諸國，爲老牌民主國家的典型。中國今日朝野所希望的，是英美式的民主政體。國民黨之一黨專政，無疑的是模仿蘇聯的。不過國民黨政綱規定訓政以後有憲政，不像蘇聯的長期一黨專政，是仍以民主政體爲目的，訓政不過是一段過程。但不幸這段過程太長，甜頭太多，竟使它還沒有走到目的地，便腐化起來。這正是使國民黨的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

中國近若十年來，雖然只有一個國庫，却經常支持着兩個政府的開支。平常所謂政府開支，當然是指自中央以至省縣的薪給費用。但我們除了政府之外，還有黨部團部，也是從中央以至省縣，層層都有的。這二者的人員合起來，規模也就不小，再加許多又像公團，又像秘密的什麼「統計局」，其經費並不列入國家預算。而數目之大，恐全國無一人能「統計」。把這些合起來，大致不會小於一個經常政府機關的開支。這些黨、團、局的人員，你說他們沒有工作，他們是經常在辦公，開會，出差的。但如果問他們的工作和老百姓，和國家，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必要？恐怕沒有人能回答出來。他們工作的關係和必要，是純粹的屬於黨的。

光是吃飯當然還不够，還得升官和發財。國民黨是一來就喊出「黨權高於一切」這口號的。因此黨員總有官做，至少有飯吃。要做官必須填入黨證書。有權斯有利，升官斯發財。這也鼓勵了許多青年和青年，不想求真實學問技能，求進步，只要靠黨，必有飯吃。黨籍是做官的必要資格，是長期的飯票。黨員團員多多益善，反正由國庫開支黨費，不怕沒錢，有爲的青年入黨或入團以後，漸漸覺得工作無聊，另謀正業去了，剩下來的別無他長，只好長吃黨飯。這使國民黨受了反淘汰作用。黨權既高於一切，則自然造成「黨員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現象。政治如何搞得不好？不如此，甚至爲國家造就人才，也以黨爲門檻。高者，是考試院（一個政府機關）主辦的，但錄取人員須入訓練團受訓，否則沒有錄取證書。而受訓則必須入黨，這使許多被迫入黨的黨員未必如理想的「忠實」。在另一意義上，亦即非國民黨員即無做官資格。戰前有一次舉行的黨員留學考試有英文交白卷的，也被錄取留美，通知其補習英文一年再出國。此人並未補習，因此並未出國，但却做了比許多前輩留學生更大的官，這使官吏的素質大爲低落，政治如何搞得不好？一個黨及其黨員有這許多特權，怎麼會不趨於腐化？滿清的「皇權制」據說是洪承疇想出來的，我不知道「黨費國庫開支」「黨權高於一切」這兩件打擊國民黨的武器是誰發明的。

反過來講，既有這麼一大批人靠黨生存，則黨的利益自然比什麼都重要。假使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衝突時，當然要犧牲人民。國民黨之堅持要保留國大舊代表，而犧牲人民的選舉權，是最好的證據。其他一切「國營」「統制」等等，幾無不可視爲黨與人民利益衝突時的解決方案。

在英美式的民主國家雖然也有政黨，輪流執政，但他們沒有這種三百六十行以外的職業，吃黨飯或吃團飯，因此也沒有發明黨費可以從國庫開支這個秘訣。熱心政治的人自然也從事黨的活動，但他們沒有和政府平行，甚至在政府之上的龐大系統。在競選時黨是要化點錢的，但無須經常維持自中央以至地方的一套機構。黨的中堅是資本家，他們不是以黨起家，而是以企業起家，爲了企業的利益，才熱心於黨的活動，因此不但不能靠黨弄錢，而且還得爲黨化錢。可以說英美式的民主國家，熱心政黨者都另有正業；黨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故不會有「黨權高於一切」，開口「黨國」，閉口「黨政軍」一類現象。這種政治方式對不對是另一問題，

但中國既要實行民主憲政，只有先採取英美式的政黨活動方式與義律。

現在政府要選政於民了，因此做了兩件善舉，第一是黨費不從國庫開支。第二是延攬各黨派參加政府。關於第一點，自然是好現象。但是和全國教育經費數字一樣大的青年團團費，却因為該團劃歸政府而仍由國庫開支。這個團雖然也不免和黨時有摩擦，但舉世周知它是國民黨的外衛組織，團員是預備黨員。至少這個團既不能算無黨無派，也不能算屬於任何別的黨。團從國庫開支，它做些什麼工作呢？據說是從事青年教育工作，果真如此，則政府必先假定今日全國大學的教授講師一切學者都不足以勝任教育青年的工作，必須由青年團團員來代替他們。並且政府在去年即已聲明黨團退出學校，這個團是否在校外教育？以中國今日科學之不發達，正常教育之不够，教育經費之缺乏，而耗此鉅款以養青年團團員，美其名曰「教育青年工作」，這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人的謀國之忠。

其實說穿了誰都知道，黨團一家人，不過是借此名目，改頭換面以仍養黨員而已。國民黨對於「國庫開支」這層誘惑，始終沒有耶穌所謂「撒旦，退下去！」的精神。

至於第二點，邀請各黨派參加政府，雖然是民主政治中無可奈何之事，也使老百姓不能不懷疑這些被邀請黨派的利益是否與人民利益相符合。我們不能想像有些人除了黨以外不能有別的正業，而其才能足以任國家的大事。當然在野黨的若干領袖，其學識才能均為世所共見，但如果中央地方各級政權全部開放，這大批除黨以外別無正業的「什麼黨黨員」突然都做了官，或者自其現有職業中跳出來升了官，是否政治就民主起來，國家就上軌道，也不能不令人疑慮。政府目前開放政權的對象，是一些經常以黨為業的人。而今日中國以黨為業者，却真是全國人民中最少之少數。這些人參加政府以後，或許至多可收一點互相牽制，使不太胡鬧之效，其他則未可逆睹。故政府今日雖口口聲聲說「還政於民」，而實際上則只能「分政於各黨派」。這些黨派在未得政權以前固然有的刻苦奮鬥，有的明喊民主，暗送秋波，但一旦滲入各級政府，甚至在各省各縣也掛起招牌，設起黨部，吃起黨飯來，第一他們從那裏來這許多經費？第二，他們是否還肯尊民為主，把人民利益放在各自的黨派利益之上？也大是問題。

因此我們為愛護已執政及將執政的黨派起見，為珍惜中國目前這一點民主萌芽起見，主張任何黨派的任何組織，都不可以暗中從政府中支用錢，也即不要再指指背背已盡的人民的油。一個黨要生長進步，必須其黨員人人有獨立謀生的學識技能，有黨以外的正當職業。任何黨派，不論在朝在野，不應該使黨成為衙門機關，成為黨員的飯地。必如此才能使人之入黨，是為熱心國事，而不是為嗚嗚而來。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一切黨派健全，有能力。政府既說開放政權，應該向全國的賢能開放，不應只向黨派開放。黨派可以參加政府，但應該是為其政治主張而參加，不是為解決該黨的「經濟問題」而參加，更不是為「配給」該黨的「黨員飯碗」而參加。孫中山先生論「政黨政治」說：

「以黨治國並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後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民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後才可以治。換句話說：以黨治國並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這幾句話雖然是專對國民黨而言（而且彷彿是針對今日之國民黨），我想今日朝野的一切黨派都應該牢記這條原則。

附記：我這篇文字沒有批評到共產黨的情形，這並不是說中共無可批評之處，是因為還沒有了解中共的「地方政府」與該黨的經濟情形。如果中共的黨的費用也由其地方政府經費內開支，自然也在同樣批評之列。我們推測起來，大致也是如此的。否則中共的黨費來源將成爲一個很大的謎。關於這一點，仍希望中共能使我們這些非「解放區」人民知道其真實情形。

### 文 化 小 廣 告

每字收費一百五十元

#### 徵 求 郵 票

統一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奉安新 不加字 原膠 四方連

如願出讓或交換請函上海仁記路九七號內三〇七  
室秋溶

# 論教育政策

蕭公權

近來國內人士頗有關於「國定本」中小學教科書的討論。反對國定本的言論多注重於教本內容的惡劣。其實我們的整個教育政策需要根本檢討。教本尚是一個枝節問題。

三十餘年以來的教育政策顯然可以分做兩個段落。從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政府所行的教育政策大體上是放任的（假定那種放任辦法可以稱為政策）。從國民政府成立到現在，政府所採的是訓政教育或黨化教育的統制政策。

放任政策的結果可謂得失相參。第一個供人指摘的惡果就是教育界的混亂狀態。通都大邑之內「野雞大學」如雨後春筍，東起西伏。各地商店式的中等學校也應市而興。出洋留學的自費生幾乎是肩隨踵接。學校的內容是否充實，教師的修養是否足夠，學生的程度是否合格，政府事實上並不過問。教育部幾乎「無為而治」。除了學生鬧學潮以外，教育當局很少干涉學校的生活。祇要有學費，便可進學校，祇要是學校，便可發證書。今日時常聞耳的青年失學和偽造證書問題，在當時是難於聽到的。這不是於學生有較高的程度，而是由於社會有濫收學生的學校。不一定是因為從前的青年更加誠實，而是因為沒有偽造證書之必要。至於出洋留學，更是富家子弟的一道方便大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金曾跌落到每元值國幣九角餘。民國十七年前後不過漲到每元值國幣兩元餘。外匯既無限制，護照亦可隨領。富家之子縱然不懂外國語文，不會在國內合格的學校畢業，好在家裏有錢，正好利用良機出國——去開眼界、找娛樂、混資格。混住了一兩年，回國之後便可「大賣野人頭」。博士碩士或學士的頭銜隨意選帶。誰又來稽按其真偽？縱然在外國鬧了笑話，甚至犯洋法，坐洋監，誰又來追究既往？當時國內外學生品流之混雜，國內學校內容之不齊，今日中年以上的教育界人士類能言之，筆者豈敢捏詞誣謗？

西諺說，每朵黑雲都有一道銀色的邊緣。在民國初年混亂的教育狀態

之中也不無一些收穫。政府放任，即是學校及學生自由。有些人濫用了這個自由，另外一些人却從自由中得到進步。正因為政府沒有用死板細碎的法令規管制教育，所以學校和學生可以在自由競爭的環境當中各求長進。壞學校誠然因有壞學生照顧而存在，好學校也能吸引好學生而聲譽日隆。這些學校在錄取新生的時候不受證書名額等的束縛而以投考成績為主要的標準。這些學生憑仗自己的學力去投考，證書是沒有關係的。這樣的放任辦法無形中鼓勵學生致力於學業本身而不注意於外在形式。因此在較好的學校當中便養成了好學的風氣。批評者雖然說那時候的學生過於「讀死書」，不大關心社會和國家的實際問題，然而一般人讚許的「五四運動」就發生於這個時期。今日五十歲上下在社會或政府中知名的人士多是那時候的中學生或大學生，也就是放任政策的一部分產品。而且，就教育的觀點看，專心求學不能算做不好的風氣。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教育政策起了重大變化。政府根據訓政時期的原則，鑒於放任政策的流弊，採取了統制的教育政策。施行的經過，國人多耳熟能詳，不必於此追述。施行的結果，筆者認為也是得失相參（縱然不至於得不償失）。時賢指摘統制政策，持論或不免過度苛嚴。例如有些人忘記了抗戰所引起的困難，無意中把一切罪過都算在這個政策的帳上，還不足以令人心服。平心而論，統制政策糾正了以往的若干病態，也引起了一些新的缺點。

第一個顯見的缺點是政府對於教育的管導過重形式的整齊而忽略了內容的發展。各學校的課程、院系、考試、證書、校曆等事都由政府規定，核發或核定。政府對於各校學生的真正程度却缺乏有效的考核或獎進方法。就是形式上的統制也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其中原因之一便是政府的方法頗有窒礙難行之處。例如政府規定各大學課程應有期終大考和期中小考。各教員應將考卷交校存查。其用意顯然在防止教員怠職或濫定成績。殊

不知大學的課程有些宜於隨時測驗，有些宜於自發的研討。考試不一定是評定成績的妥善辦法。放試的卷子應當由教師批閱後發還學生，讓他們知道得失所在，俾求改進。存校的試卷誰來查看？存查云云不過為學校添一大堆廢紙。又如前幾年政府勸行中學畢業生會考制度。其用意雖在考核中學的實際程度，而其施行却有困難。有些不長進的學校到了學生將屆畢業的一年便改變教學的常軌而策勵學生致力於應會考的準備。它們有時候竟會把「畢業班」學生的分數一體提加，以便與會考分數合併核算以後多得「及格」的機會。會考的題目縱然十分審慎合理，但各校教員授課的側重點（甚至內容）每有歧異。因此應考生的答案不一定就表示他們的實際的程度。政府要考核各校的進度為什麼平日不委慎監督或嚴加獎懲？既准許學校讓學生結業，却於結業之後舉行「勞民傷財」的會考，似乎有失情理之平。會考之後政府對成績低劣的學校既少有效的懲罰，對成績合格的學生又無升學的保障，徒然使成千成萬的學生在炎天暑氣之中連應三考（中學畢業，教廳會考，大學入學），真不知所為何來。至於會考中舞弊賈題等流言，雖然未必果有根據，但其眩惑耳目，敗壞人心的影響足以抵消會考可能得到的任何利益而有餘。又如照規定，中等學校畢業證書由教育廳核發，大學畢業證書由教育部核發。這個辦法在本身倒沒有重大的錯誤，但可惜政府的辦事手續往往過於遲緩，學生畢業了一兩年，甚至服務了一兩年，核發的證書方纔到手。各校為顧全學生升學或就業的機會起見，祇有先行發給畢業證明書。其結果就是核發的證書有時幾乎無用。讓初離學校的青年親身體驗到政府辦事的缺乏效率，這不能說是良好的教育影響。

政府統制留學生的公費自費考試較有成效。但可惜達官貴人們的少爺小姐，和放任時期的平民，或富家子弟一樣，不須經過考試就能到外國去進大學或中學。從前放任的結果是混亂。現在統制的結果是不平。不平的統制也有敗壞人心的反教育作用。

統制政策的第二個缺點是當局注重黨化而忽視了推行黨化教育的必需條件。執政黨想用種種方法擴充維持自己的勢力，是可以原諒的一件事。在國民黨訓政期間推行「三民主義的教育」也是極自然的一件事。如果推行得當，把孫先生的學說普及全國青年，未嘗不是奠定民主憲政基礎的一

個途徑。但可推行這個政策的人注意於排斥異己而不十分努力於健全本身，着眼於黨化的形式而不措手於教育的內容。例證隨處皆是。依照政府的明令，各學校舉行紀念週，大學裏要設黨義（後改稱三民主義）的課程。根據黨部的密令，各校內不容「異黨」活動或立足。全國私立學校沒有公然違背這些命令的。然而實際上的效果却不見佳。「異黨」或不同情的教員被排斥的確不乏其人。延攔入校的「本黨」教員却不一定有够水準的學術品行。其中有一部分對於教育工作本無興趣，他們為了博取資格而走進學校（大學教授有簡任官的銜叙資格）。然而走進學校也要資格。他們有時候能够偽造資格。筆者曾親遇一位黨員教授，他雖會由黨部資送某國留學，自稱得有學位，但其實際不僅西文不通，中文也未通。在講堂上東拉西扯，不知所云。學生喜其給分寬大，學校當然不加追問。一般黨籍教員往往對學生的學業放鬆，對黨務的推進加緊。祇要學生「加入」，成績雖差，可以及格，將來出路還有保障。結果是入黨的學生不一定好學，好學的學生得不著學校的鼓勵。學校的好學風氣也就逐漸淡薄下去了。黨化教育推行不善，竟至發生了反教育的影響。有一位國民黨的教育家會對筆者說，我們要先能「教育化黨」然後才能「黨化教育」。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言。可惜一般推行黨化教育的人沒有他這樣的認識。

因為本身條件不夠，黨化教育的一切措施都難於收效，教黨義或三民主義的教員不一定有博雅學術或真誠的信仰。上堂開講往往是照本宣科或信口開河。對於這樣的「黨八股」和「黨雜碎」，學生很少發生興趣。師生間彼此心照，大家鬼混。至於紀念週——如果不嚴格點名，不嚴格執行缺席罰，學生很少自願出席的。唱黨歌，念守則，讀遺囑，多成了缺乏精神作用的死形式。如此推行黨化教育，恐怕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無論統制政策的成敗如何，在當今憲政的前夕，我們的教育政策又到了一個重新改定的關頭。憲法基本國策章中教育政策的規定雖然空泛，但也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第一五八條規定「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第一五九至一六一條規定普及教育的政策。第一六三至一六七條規定保障和獎勵教育的政策。第一六二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受國家之監督。」從這些條文看來，似乎憲法所採的仍是統制的政策。但一加分析便可以知

這它和訓政時期的統制政策大有區別。教育文化機關雖然依法要受政府的監督，然而按第十一條的規定，講學自由是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一切憲法保障的自由除了在妨害他人自由或社會利益秩序等條件之下以外是不容政府干涉的。任何政黨的黨化教育都有違憲法的精神。

具體地說，政府應該如何監督教育，是一個極重要的待決問題。筆者認為參證以往的經驗，斟酌民主的精神，依據憲法所定的政策，政府的監督範圍應當以儘量縮小、不應當以儘量擴大為原則。監督的方式應當以積極獎進、不應當以消極限制為原則。

教育文化本身是一個前進的努力。愈是自由，愈能發展。在正常情形之下，一個國家的社會及政治生活都從文教發展當中獲得方針與進步。爲了防止教育誤入歧途並協助工作推進起見，政府誠然應當對它酌量監督。然而過度的干涉會使教育的生機枯竭，其弊不可勝言。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理由。發展自治精神是憲法規定的一個教育目標，保障講學自由是憲法賦與的一個人民權利。自治精神祇有在學校的自動自主生活當中培養。講學自由祇能在教師自擇自決條件之下存在。因此政府對於教育機關的監督應當避免干涉課程教本的內容，教員的思想以及師生的生活。國家把教育的責任交給學校，交給教師，而向他們責取應有的效果。這才是合理的監督。越出這個範圍的禁令便是煩擾的干涉而不是合理的監督。在煩擾的干涉之下想達成發展自治精神的教育，正如古人所謂緣木求魚。這是第二個理由。監督的作用在於防止誤入歧途。這可以採取兩個不同的辦法。一是封閉旁門，二是開啓正路。後者較前者爲易行而有效。教育當局可以在不侵害講學自由、學校自治的範圍內，用適當方法去疏導學術潮流，使其大勢趨於合宜的方向。這略如大禹治水的妙用，不在築堤遏水而在因勢利導。這不是「統制」而是用獎勵來引導。政府祇要積極提倡合乎國策的教育文化工作，多數的人自然會趨向於這些工作。政府認爲不重要、不需要、甚至不當有的工作也不必加以限制或取締。從事者自然不會衆多，讓少數人去作這些工作，決不會發生重大的禍害。何況政府認爲不需要的工作，事後却可能被發現是很重大的貢獻。科學史裏不乏這樣的例證。這是第三個理由。

總之，發展教育最好的方法是把地方自治的原則應運到教育機關。我

們可以稱之爲教育自治的原則。依照這個原則，政府應該避免干涉講學內容和學校生活。

講學內容和學校生活都不受干涉，政府監督教育之權豈不太小？假如師生中有了不道德或不合法的行爲，政府也不加干涉嗎？

先就法律說。學校裏的師生都是國家的人民，他們同受法律的保護和制裁，却並不享受法外的特權。他們如果有了犯法的言行，祇要他們有法律上的行爲能力，司法機關應當加以法律的制裁。這是司法機關職權範圍內的事，不是教育範圍內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會認清這個界限，有時越出法律範圍以外直接或間接干涉師生的生活，到了學生有違法行爲（尤其是羣衆的違法行爲）的時候，却又不能讓司法機關執法以繩。這種辦法不但不能發展國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養成了一些青年蔑視法律的習慣。（社會人士稱強橫的軍人爲「丘八」，稱放恣的學生爲「丘九」，不爲無因。）這是必需糾正的。學校在平日要培養守法的習慣。教育當局雖然不干涉師生的犯法行爲，自有司法機關負責追究。學校不會因此而至於無所事事。

就道德說，政府誠然不能坐視師生的人格淪亡。然而生硬的干涉手段是無補於事的。古代哲人和近世教育家多認培養道德的有效方法不是干涉或口說，而是潛移默化，以身作則。如果師長、家庭、社會和政府的榜樣太壞了，當局者縱然三令五申，以行善相勉，青年人還是難於接受的。至於強制責罰的方法，尤其不通過收到「免而無恥」的效果，不足以啓發學生的自覺自重心理。一位任中學訓育主任的朋友曾告筆者，某公的兒子在他任職的校內求學。這個家境優裕的學生，平日既不讀書，行爲也極放縱。訓育主任向他作一次最懇切的勸導，以他父親的崇高地位和盼子成器的期望爲說。他却很直率地答復「不提父親也罷了，他平日貪贓枉法，荒淫無度，還能够管我嗎？」這位訓育主任可算是失敗了。但失敗者不祇他一個人。一般的學校儘管設置訓育主任或訓導長，儘管用記過或開除的方法處分學生，儘管高談正心誠意的大道理，許多學生還是行惡犯規。這不僅是人的失敗，也是法的失敗。道德生活不是在統制政策之下能够生長的。

筆者認爲教育當局必需用教育的精神和方法去推行教育政策。部長廳長們都應該有教育者的風格（略如黃梨洲所謂詩書書大之氣）和尊重學術的誠心，以爲全國或一省師道的倡導。師道果能尊嚴，學術果能見重，多數的學生自然會潛心向學。潛心學術的人是不傾向於違法背德的。少數犯法的師生會受司法的裁判。少數背德的師生會爲衆議所不齒，也不能發生敗壞風氣的影響。政府又何必干涉講學內容和學校生活呢？

因此筆者主張我們今後應該用教育機關自治的原則去推行國家的教育政策。這樣才能够避免放任政策與統制政策的缺點。

# 雞蛋直立的

戴文賽

雞蛋可了直立嗎？你看見過人人把雞蛋站起來沒有？你自己試過沒有？

一定有許多人聽見過哥倫布站雞蛋的故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回到歐洲，有一次在好些人面前報告他發現美洲的經過。有些人很刻薄地譏諷他：「發現一個新地方有甚麼難，有甚麼了不起，誰都會做這種事。」哥倫布請人給他一個雞蛋，對在座的人說：「你們中間那一位能把這個雞蛋垂直站起來？」沒有人敢去試。哥倫布便拿起雞蛋，先在掉上敲破一端，然後使雞蛋在破的那一端站起來。又對大家說：「這不是很容易嗎？知道了怎麼做便甚麼事情都是容易的。」在德文書裏也可以讀到這個故事，不過有一點不同，根據德文故事的說法，哥倫布不是先把雞蛋的一端敲破，而是先撒點食鹽末在掉子上，然後把雞蛋站在鹽末上面。

這個故事表示哥倫布之前，在西方還沒有有人不用任何巧計就把雞蛋站起來。哥倫布是在公歷一五〇六年去世的。四百多年來在西方也似乎沒有，或者極少有人曾經站過雞蛋。要是有些好站過雞蛋，書裏一定會有些記載，口頭也會傳下來。

我國古書提過雞蛋可以在立春日直立。據說我國各地好些要巫術的人也常把雞蛋站起來，使人相信他們有一種一般人所沒有的能力。作者個人從前都沒有看見過雞蛋站起來，也未嘗聽見任何年長的親友提起過這件事。前年（一九四五年）立春日在重慶，宣傳部裏一位姓楊的職員站雞蛋給外國人記者看。全重慶馬上有許多人也試站雞蛋，中國人外國人都試。大多數的人都能站成功。不只立春日能站起來，三個星期以後也可以站起來。滿城風雨，很快地就被外國記者傳刊外國去。那一年三月或四月裏，美國「生活」畫報登出相當長的一篇文章，描寫重慶人士熱狂站雞蛋的情形，還登了許多照片。許多別的雜誌和報紙也都登載這件事，因而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大科學家愛恩

斯坦的名字也常被牽牽進去。

去年立春日作者在昆明那天早晨在報上第一次看到雞蛋在立春日可以直立的消息。當下午五點半鐘回到住所，看見幾位同住的人坐在洋灰地板上站雞蛋，已經有八個雞蛋站起來了，好像一隊穿白制服的矮子軍。這還能夠不相信嗎？哥倫布當年怎麼不這樣子試一下呢？何必使用巧計！作者自己也參加這個站雞蛋的遊戲。先檢起一個肥一點的，以為矮點胖點的也許容易站些。試了十分鐘，還是站不起來。以為自己手法不夠靈，耐性也不夠；幾乎想棄權。可是看到別人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聽到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便鼓起勇氣，再接再勵。換了一個瘦長的雞蛋。這回竟在兩分鐘之內把它站起來，高興得拍手歡呼大跳起來。從前以為不可能的事，現在做出來了，能不快樂忘形嗎？接着又很快地站了一個。那天大家一共站了三十幾個雞蛋。以後幾個月，作者還站了好幾次雞蛋給朋友看，證明不一定要在立春日下午五時至七時之間才能夠把雞蛋站起來。

立春日是二十四節氣的第一個，意思就是每年春天差不多在那一天開始。在陰曆裏，立春日沒有很固定的日期，可能在十二月裏，也可能在正月裏。根據陽曆，立春日總在二月四日左右。每年春分日總在三月二十一日。春分點就是黃道（地球繞太陽的軌道）和赤道相交的兩點之一。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太陽從赤道之南經過春分點移到赤道之北；九月二十日，太陽從赤道之北經過秋分點移到赤道之南。把春分點和下一個春分相隔的時間分做二十四部分，每兩部分交界就是一個節氣。在立春日，太陽正在寶瓶宮。實際上在我國每年立春日天氣還是很冷，在華北東北蒙古新疆一帶，在那一天可能還會下大雪，說它是春天的開始未免太早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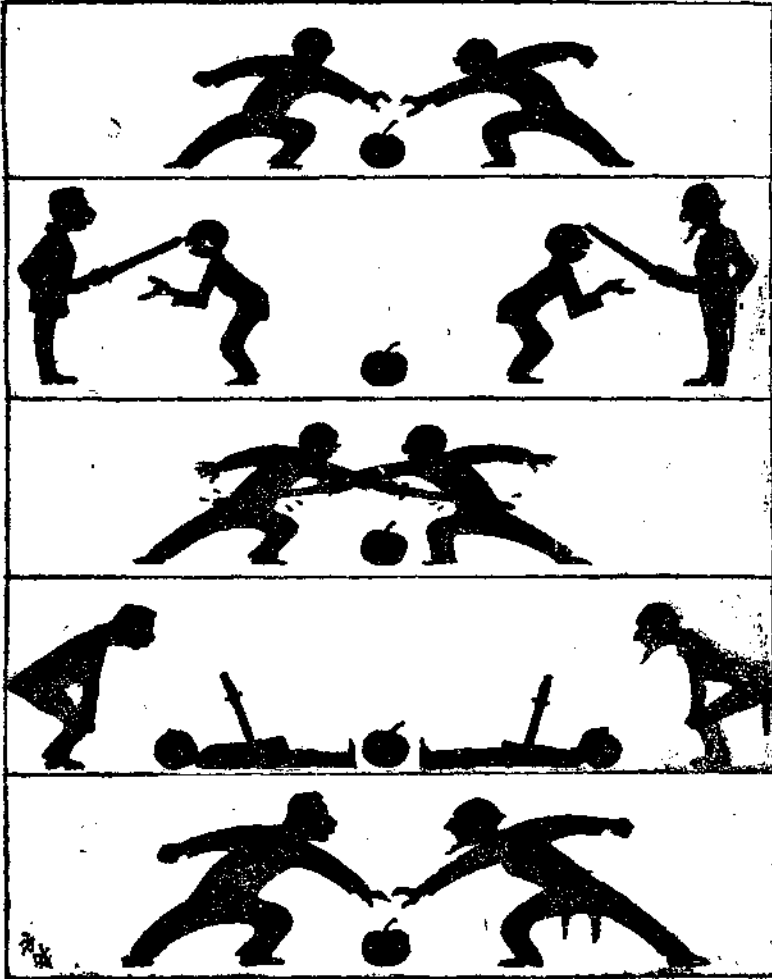
地球繞太陽的軌道是橢圓形的，太陽在兩個焦點的一個上面。所以地球離開太陽有時候遠一點，有時

候近一點，地球最近太陽是在一月二日左右，離開太陽最遠是在七月二日左右。如果雞蛋在每年某一時期比較容易站起來，或者只有在那一個時期裏頭才能夠站起來，那麼若不是和太陽有甚麼直接的關係，就是和季節有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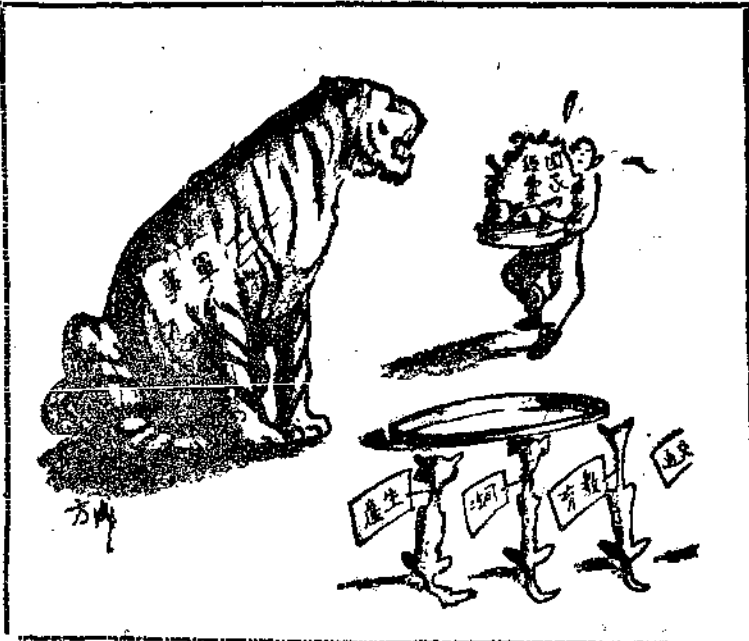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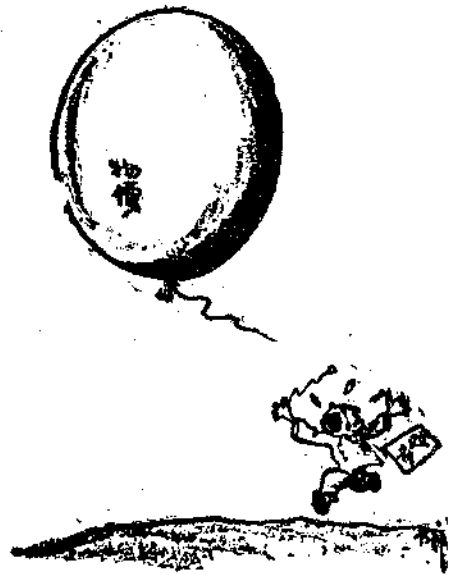
太陽的質量比地球大三十三萬二千倍，太陽離開地面一萬四千九百六十四萬公里，地球的半徑（就是地心離開地面）等於六千三百七十公里。從這些數字可以算出：地面上任何物體受地球吸引力的影響比受太陽吸引力的影響大一千六百六十倍。每年太陽遠近的變化只等於平均值的百分之二，所以和雞蛋直立不直立這件事關係非常小。

爲甚麼雞蛋常常是極難的躺在一個平面上呢？那是因爲橫躺的姿勢是比較穩定的姿勢。反過來說，直立的姿勢是不穩定的姿勢。問題就是：這不穩定的姿勢是不是一可能的姿勢？從前的人不去試站雞蛋，所以總以爲直立的姿勢是不可能的，或且認爲要得到那種姿勢是極難的，難到不值得去試。兩年來我個人先把這個普遍的觀念打破了，把這種不應存在的成見消除了。好多人看見雞蛋直立起來了，好多人自己也使雞蛋直立起來了。好多人外國人，好多哥倫布的子孫們，也都被我們中國人說服了，也都看見雞蛋直立了，也都相信這種事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容易的。

要使雞蛋直立，得先選一個很平的平面，如鏡子，光滑的桌面；或光滑平坦的地板。如果地板是洋灰的，或鋪磚的，那就不怕有人在地板上走動。如果地板是木頭做的，尤其在樓上的話，便不可以有人走動。站雞蛋的平面如果稍爲震動，雞蛋便站不起來。站的時候，最好用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和左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這四個指頭輕輕地支持着雞蛋。然後輕輕把雞蛋前後左右移動，常常試把四個手指挪開，看是不是已經移到了那所要找的位置。到那位位置的時候，手指雖然挪開，雞蛋還是站着，那你就得到一次成功了。若是沒有人動它，沒有風吹它，平面繼續不震動，那麼這個直立的雞蛋可以像不倒翁一樣繼續地站着。有事候站起來的雞蛋並不太直，而是稍爲傾斜，好像義大利比薩城的斜塔。用物理學的話講出來，只要雞蛋的重心在經過雞蛋和平面相接觸的（下接二十二頁）



# 觀衆面







#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

## 台胞恢復中國國籍，美國尚未完全同意

## 台銀騙案牽連頗廣，匯率提高久遭擱淺

## 農民過節下鄉慰勞，糧食問題逼出行動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台僑）中國國籍，前得英方通函，不久以前，因南京中央日報臺北通訊「臺灣人思獨立」一文，引起過國大台僑代表發表聲明。最近又有一個更為刺激的新聞，即外交部函覆臺灣國大代表，關於臺灣國籍一節的公文，原函摘錄於次：

十一月十一日拜啓

這使憂心愛國的臺胞，大為驚訝。原來「臺灣人的地位尚未決定！」「臺灣人的國籍需要美國同意！」在這前後，上海大公報發表了蕭乾的「冷眼看臺灣」一文，也提到了「臺灣將成爲中國的愛爾蘭？還是內向爲中國的一肢？」的問題。這使我們回憶到美國生活雜誌發表過一篇愛金生錯誤報導的消息，他說臺灣人時思獨立

，要受美國或日本的保護。台胞對於此一報導，時時加以嘲諷。依我看，台胞對目前政府措施，由不滿意到痛恨是事實，但就未必自絕於中國。然而台胞對此一問題的看法，我們估計已有若干轉變。他們說：「爲謀台胞人的福利，爲謀整個民族將來的繁榮，我們的國籍問題，是決定於我們自身，是由六百五十萬台胞人民的總民意來決定。……」

政治是最現實不過的東西。我們現在分析一切阻止台胞政治上傾心內向的因素：第一，中樞賦予龐大權限的長官制。長官制本身的優劣，我們暫不討論，但給台胞以不愉快之感的，便是中樞對於台胞，并不是用同等的眼光來衡量，一如對其他省份。最直覺的看法：這與日本在台採取用總督制有什麼區別？這問題，心理的因素比政治的因素大。其次，台僑在言論出版及其他方面，很少自由。政黨黨代辦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的新聞事業。書刊出版，并不容易。至於言論稍激一點的，更不用談。一場震驚的蔣渭川案，結果是逼着他寫下一個悔過書。第二，高級官吏固然很少台胞，連地方自治，長官也要堅持經過三年的訓練。主要的理由是由是說「台灣沒有政

之有利地帶。」

## 東北形勢

### 又告張緊

魯中之一波未平

東北的一波再起。蔣主席到濟南以後，接着又飛北平，那正是濟華北大兩校學生因抗議北平當局逮捕市民千餘人而罷課的時候。但此次行蹤各地報紙均未記載，雖然以前飛徐飛鄭飛濟的消息，南京官報均有一人能通靈指揮的人一到，推進是可以操左券的。過蘇北、魯南、皖北、豫南幾次戰役都是如此。傷筋動骨的是撲上去往往是空城。魯中之役，二月二十三日延安宣傳解決了七個師，俘李仙洲及兩軍長。廿五日彭部長向記者招待會中有人提出此點相詢，記者沒有聽見他正面否認，祇說報紙可以證明，三五日後自見分曉。但這種問答，在南京的報紙上是看不到的，雖然也不諱言「膠濟路兩側國軍轉進戰略上率，友軍之間，有意的無意的缺少連絡，不能互相學習作戰經驗。但配備兵力都比共軍爲強，所以只要有一個能通靈指揮的人一到，推進是可以操左券的。過蘇北、魯南、皖北、豫南幾次戰役都是如此。傷筋動骨的是撲上去往往是空城。魯中之役，二月二十三日延安宣傳解決了七個師，俘李仙洲及兩軍長。廿五日彭部長向記者招待會中有人提出此點相詢，記者沒有聽見他正面否認，祇說報紙可以證明，三五日後自見分曉。但這種問答，在南京的報紙上是看不到的，雖然也不諱言「膠濟路兩側國軍轉進戰略上

技術人員，可以從容利用，從容訓練。哈爾濱又是富庶之區，不比魯中之貧瘠，所以今日在東北共軍之裝備與人數，事實上無法估計。

但在國軍方面，東北的部隊都是最精銳的，裝備既好，又無指揮不能統一之弊。中原戰場臨時調來增援的部隊，有湘、桂一帶的，方言與當地不同，軍民聯繫也不易。東北駐軍已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與地方感情已通；而且安定，也可以增加人民的向心力。所以東北之戰，兩方均有優點，均有重武器，其慘烈將不可想像。現在各地中共聯絡處已在陸續撤退，重慶的新華日報也停版了，看來今後的內戰，要造成中國歷史上內戰的最高紀錄。逼近內戰區域的城市，照例要把人民從被窩中拖起來檢查，上千人即當入獄。從內戰想到通貨，想到緊急措施之類，人民將有一個很長的時期發呆下去！

治人才。」這使台胞最受刺激。台灣有完備的戶口登記，精確的土地測量，工業交通發達，衛生設備完善，教育普及，公民的訓練良好，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應享受相當的自治。

在台灣，經濟上所受的壓迫，比政治上的不自由，更為深刻。許多工廠喘不過氣，失業的浪濤打擊着每一個快要瀕沒的人。物價的猖獗，購買力的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貪污，舞弊，搶劫，淫佚和走私等問題。台灣現在正維持着一個特殊的經濟系統，採用着一個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但此顯然並沒有解決她的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忍對台灣此一特殊經濟統制和系統加以責難，那末我們必需要歸之於行政的無能。使：胞最為痛恨的事是專賣、貿易兩局貪污案件，至今將以不了了之。盜案累見不鮮，搶劫白晝，走私是有規模和組織的；於院酒

館之多，如雨後春筍。最近省營印刷廠廠長石德寧親引賊，大肆貪污，和牽累極廣的台灣銀行鉅大騙案，據云案情複雜，這又成了台民攻擊的目標。

經濟統制，表現於若干集權國家，曾有過相當的效果。譬如說德國，德國的經濟統制，便是從控制國際貿易和外匯入手。德國人民手中不得握有現金、外幣，在外國的投資和在外國銀行的存款。申請外匯，需經過嚴格審查。國內則採用配給制。德國在第二次大戰前（一九三二），外匯管制極為有效。在日

本求投降前的台灣情形，生活水準比戰前雖然降低許多，但經濟上也頗為安定。我

再就維持匯率本身來看，台灣經濟似難尋求一相當的出路。兩三個月來，台幣一直下跌，報紙上雖然不斷用心理刺激方法發出提高匯率的消息，但並沒有生效。管理匯兌另一條件是要管理區域內的貨幣

價值不生變動；而台幣則似乎一直在膨脹。黃金、外幣（包括美鈔日幣港幣等等）莫不身價十倍，成為投機和領導物價的先驅。匯兌到了山窮水盡地步，遂正式於一月二十九日起暫行停止內地公務人員和商業的匯款。嚴家淦處長，奔走京滬之間，一再與當局商洽提高匯率，并以土產品抵償向中央中國兩行銀額借款，至今尚無滿意結果。據說當局允許台銀採用人為方法調節匯率，隨時視情況將台幣提高或抑低，并且允許人民團體如商會等，參加審查申請商匯。這是否生效，問題還多。此外生產停頓，通貨膨脹，失業，儲蓄與投資的失衡，也是經濟上的主要問題。但如果在國內沒有和平，中國經濟沒有出路，則台幣要維持一「特殊」的經濟系統和經濟統制，也是十分困難的。

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并而存。相伴而生。月來米價續場，雖然報紙每天登載「三、操縱奸商應將吸吸吸財捐獻救濟餓死人民遺族及失業民衆。」

「以上各奸商巨賈地主團戶接受本團忠告，痛改前非，勿作貪夢，否則本團當選諸言，採取有效行動，須勿悔之莫及，此告！」

台灣民衆反對抬高米價行動開啓。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日。

這種恐嚇式的傳單，真是紀念農民節的一大嘲諷。農民節這一天，米價仍在僵持，我也看見開出各鄉慰問農民的车子，幸好行動團並沒有真正大規模的行動。倒是有另一種行動代替了，即是就在這一天，大批的「敬言」先生出現街頭，而且在先一夜之間，紅綠標語和行動團的傳單，一起都不見了。

最後，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來自台北）

一是自然或市場匯率，現在台幣與國幣的法定匯率是一比三十五，而市場匯率是一比二十七，如果利用裁定(Arbitrary)匯兌互相買賣(Reciprocal Sell or purchase)方法，由台灣銀行匯出一千萬台幣到上海，就可得國幣三億五千萬，再將此三億五千萬的國幣匯票，賣與省內的進口商，用市場匯率一比二十八計算，就可淨賺台幣二百五十萬。去年底台灣省紡織公司文書科長，串通某公司石炭調整委員會，匯出台幣二千二百萬，寄存駐滬工礦聯合辦事處，但如此鉅大的舞弊規模，終被發覺，此公遂留下一封謝罪信，「安然」逃匿。

再就維持匯率本身來看，台灣經濟似難尋求一相當的出路。兩三個月來，台幣一直下跌，報紙上雖然不斷用心理刺激方法發出提高匯率的消

息，但並沒有生效。管理匯兌另一條件是要管理區域內的貨幣

政府拋售糧食，平抑米價的消息，苦口婆心的向商地主富戶請求與政府合作，並對糧食採運購銷限制辦法，但依然無甚效果。查台灣上年產米量是六千二百多萬石，現在人口六千七百多萬，最多消費也不過六千六百多萬石，日本時代民國二十三年，產米量曾達九千八百多萬石。然則這些多餘的米是在甚麼地方去了呢？大多數的說法是游資充斥，商地地主富戶操縱，走私（走私主要的將米和糖運到日本和內地沿海一帶）。正月十五舊歷元宵節，省農林農會推廣委員會與省農會，為紀念井宜揚農民勞績，要開會紀念，并組織農家訪問隊，用意不為不善。在這天之前，台北市貼遍了各種顏色的標語，來紀念這一農民節時，我們却又在這些紅綠標語之間，發現了文辭不甚通順的「台灣民衆反對糧食米價行動團」的油印傳單。原文如次：

「一、速於本文告通知之日起，各團戶應將囤糧釋出。」

「二、米價應維持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元。」

最後，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來自台北）

再舉：走私是有規模和組織的；於院酒

再就維持匯率本身來看，台灣經濟似難尋求一相當的出路。兩三個月來，台幣一直下跌，報紙上雖然不斷用心理刺激方法發出提高匯率的消

息，但並沒有生效。管理匯兌另一條件是要管理區域內的貨幣

政府拋售糧食，平抑米價的消息，苦口婆心的向商地主富戶請求與政府合作，並對糧食採運購銷限制辦法，但依然無甚效果。查台灣上年產米量是六千二百多萬石，現在人口六千七百多萬，最多消費也不過六千六百多萬石，日本時代民國二十三年，產米量曾達九千八百多萬石。然則這些多餘的米是在甚麼地方去了呢？大多數的說法是游資充斥，商地地主富戶操縱，走私（走私主要的將米和糖運到日本和內地沿海一帶）。正月十五舊歷元宵節，省農林農會推廣委員會與省農會，為紀念井宜揚農民勞績，要開會紀念，并組織農家訪問隊，用意不為不善。在這天之前，台北市貼遍了各種顏色的標語，來紀念這一農民節時，我們却又在這些紅綠標語之間，發現了文辭不甚通順的「台灣民衆反對糧食米價行動團」的油印傳單。原文如次：

「一、速於本文告通知之日起，各團戶應將囤糧釋出。」

「二、米價應維持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元。」

最後，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來自台北）

週	末
關	欄

# 婦女女權

雷海宗

自一九一〇年各國婦女界代表在丹麥京城舉行婦女大會，爭取平等權利，並議定國際婦女運動紀念日之後，每年今日（三月八日），都為各國的前進婦女所熱烈慶祝的節日。在當時，婦女運動尚未贏得傳統社會的普遍同情，許多人仍然誠懇的相信，男女應當有別，認為兩性能力不同，所以職責不同，因而與職責相連的權利也不同。婦女運動者則認為這完全是男子壓迫女子的自私自利說法，若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給女子同等的機會與平等的權利，事實當可證明女子的能力與成就並不亞於男子。兩種對立的說法都是理論，把理論付諸事實的考驗的，是第一次大戰。

。在家庭中夫妻平等，組成家庭的婚姻也法定為男女個個都有自由。政治平等的制度更為清楚，在一切的選舉，被選舉，與政府任命方面，都不再有男女之分。最後，還有教育的平等，所有男子禁地的一般學校，由幼稚園到大學，都開放門禁，女子都可自由入學。若有不平等的話，現在是對男子不平等，今日只有不收男生的女校，而沒有不收女生的男校，當初的男女校都已成為男女兼收的混合學校。所以講法理，講制度，我們中國女權方面是最進步的；今日世界尚有落在中國之後的國家，沒有走在中國之前的國家。

最後還有一點值得提出，請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女權已為普世所公認的今日，所有的人，包括當初最激烈的婦女運動領袖在內，漸漸都知道過去的女權運動難免有矯枉過正之慮。過去好似是凡屬男子所作之事，每一個進步的女子也非去作不可。我們若把這話反過來講，說凡屬女子所作之事，每一個進步的男子也非去作不可，我們立刻就可看出那是如何的感情用事的見解。在機會平等之下，不分男女，每人各憑才力，各盡職分——這可說是今日文明世界的公認原則。在這個大原則下，許多舊的觀念仍未陳腐。例如「賢妻良母」，本是新婦女所最不要聽的名詞，但在今日女權運動最成功的兩大強國，代表資本主義的美國與代表社會主義的蘇聯，都不約而同的推崇賢妻良母，蘇聯對於兒女家多管家優良的婦女，並有正式的獎勵。真正講來，人類文化的需要賢妻良母，也正如需要賢夫良父；作一個賢妻良母的困難，也不亞於作一個賢夫良父。歪曲的賢妻良母作不得，正常的賢妻良母是每個女子的責任，正如正常的賢夫良父是每個男子的責任一樣。因生理的關係，賢妻良母可以成為專業，賢夫良父不必成為專業。這也不是說每個女子非專於賢良不可，一切皆可聽機會，才力，與興趣的支配，不可懈怠，也不必強求。能夠如此，恐怕是婦女運動的極境。

第一次大戰也是第一次的全民戰爭，只靠男子動員還不夠，至少一部份的女子也須動員，纔能應付戰爭的需要。女子除了未曾手執武器直接參加戰鬥外，前方後方的一切工作，過去普通認為完全或主要的屬於男子的的工作，在人手缺乏的戰時，女子都取代男子的地位，並且大體都能勝任愉快。事實最為雄辯，過去太嚴格的男女有別說法，至此已經不攻自破，同時各國對於婦女的戰時貢獻，也都無不感激。在事實的證明與感激的督促之下，歐美各國在第一次大戰後就都正式承認了女權，除參政權的開放外，過去未實行或實行而不澈底的經濟權與教育權也都給予婦女。惟一的重要例外是法國，法國婦女是到第二次大戰後之一九四五年才獲得參政權的。今日歐美各國，無論事實上如何，在法律上與機會上，兩性是有同等的權利。

但中國有一特點：就是這種進步的女權現狀是婦女並未大爭而就由國家立法規定的，其中也未經過像歐美各國婦女在第一次大戰期間的事實考驗。歷史上的任何權利，都是由奮鬥爭來，或由工作贏來，得來太易的權利往往是不知如何行使的。抗戰前我們的制度儘管完善，然而鄉婦對此不感興趣，並且根本不知何謂女權，連城市中比較有知識的婦女，真能利用法定的女權的，也只是極小的少數。這種法律與事實脫節的現象，部份的已由八年的抗戰加以補救。抗戰之在中國，有如第一次大戰之在歐美，對於婦女是一個考驗，並且兩次都是成功的考驗。一向與男子並肩操作的鄉婦，可以不論。城市的婦女，在抗戰之前，愈與近代潮流接近，愈有成為有閑階級的危險；雖或不甚多數，但相當大的少數的中上階級的城市婦女，往往只知享受近代婦女的權利，而未知善盡近代公民

我們只聞有婦女節，而未聞有男子節，可見婦女節，當是一時的現象，而非永久的現象。婦女運動的終極目的，應當是不再需要婦女節。我們上面所講婦女運動的極境，在任何國都尚未完全實現；一旦那個境界成為事實，我們每年三月八日將無需再努力於女權運動。願國際婦女界謀求那一天的早日到臨！

至於中國，五十年來我們一向在極力的追隨近代潮流的，女權運動在清末已經開始，到「五四」以後很快的就為輿論所接受，認為已經不成問題。在抗戰之前，這種公認的見解已經形成法律的明文，法條中清楚規定，男女經濟平等，女子也享有財產繼承權

。在家庭中夫妻平等，組成家庭的婚姻也法定為男女個個都有自由。政治平等的制度更為清楚，在一切的選舉，被選舉，與政府任命方面，都不再有男女之分。最後，還有教育的平等，所有男子禁地的一般學校，由幼稚園到大學，都開放門禁，女子都可自由入學。若有不平等的話，現在是對男子不平等，今日只有不收男生的女校，而沒有不收女生的男校，當初的男女校都已成為男女兼收的混合學校。所以講法理，講制度，我們中國女權方面是最進步的；今日世界尚有落在中國之後的國家，沒有走在中國之前的國家。

我們只聞有婦女節，而未聞有男子節，可見婦女節，當是一時的現象，而非永久的現象。婦女運動的終極目的，應當是不再需要婦女節。我們上面所講婦女運動的極境，在任何國都尚未完全實現；一旦那個境界成為事實，我們每年三月八日將無需再努力於女權運動。願國際婦女界謀求那一天的早日到臨！



# 保障人權

宣言者：朱自清 向達 吳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超 陳遠  
 陳寅恪 許鐵衡 張奚若 湯用彤  
 楊人楩 錢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戶口，發動警憲八千餘人，分八百餘組，午夜闖入民宅，肆行搜捕，據平津二月十九日各報記載：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十七人，連同前數日已入監圍者共兩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已知者如中央警官學校王云相教授，北平書齋符定一，行總平津分署組長于汝祺女士，中外出版經理社經理張亦風夫婦及店員三人，牙醫師朱硯農博士，前協和醫學院大夫蔣濬園博士，師院附小女教師二人，以及華北學院學生三人。並據當局表示：尙擬繼續搜捕。當初政府公布憲法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甚至頒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釋放千餘人，今反以清查戶口之名，發動空前捕人事件，使經濟上已處水深火熱之市民，更增恐懼。同人等為保障人權計，對此種搜捕提出抗議。並向政府及社會呼籲，將無辜被捕之人民從速釋放。至其確有犯罪嫌疑者，亦應從速依法移送法院，並保證不再有此侵犯人權之舉。」

# 有黃金美鈔的不

## 要賣出來

原講者：馬寅初

講演處：上海錢業俱樂部

原刊處：二月二十七日

上海文匯報

黃金本該集中歸為國有，可是政府過去自己弄錯了，將黃金早已散開，現在再要集中，實是很困難的事。

散在民間的黃金，集中像不容易，如何集中？用什麼來集中？若用鈔票，愈發愈多，誰要？不過黃金雖然不易集中，但用途很大，因為用途大，所以人人要保持，不容易集中。你們聽來好像我破壞政府的政策，我以為黃金倘使真集中在政府手裏也算了，倘使一轉、二轉，轉到私人手裏，又何必？以前從美國來的黃金，倘使集中在中央銀行，他們拿不走的。但是一經分散，一批一批的賣出來，賣，賣，賣，賣到他們手上了。現在中國的情形，黃金已經集中在幾個人手上了，在多數的人手裏的少量黃金，不必再送給他們。現在黃金四百八十萬，將來一千萬，兩千萬，四千萬也可能。因為黃金能夠保持價值，所以有黃金的人千萬不要賣掉。理由很多，略舉於下：

第一點，中國是農業國，是靠天吃飯的，如果年成不好，無法可想；雖說人定勝天，荒年終不能變熟年，一年成不好，進口貨源源而來，無出口貨去交換，入超甚大。例如桐油、茶葉、生絲、豬鬃可以出口交換，外匯不會少。如果受年成影響，出口少，外匯頭寸不夠，這時候黃金的用途就大了。中國幾千年年入超，以前還

有僑匯補充，現在南洋受了戰爭影響，華僑也一敗塗地，一時僑匯沒有恢復原狀的希望，所以進出口的差額必很大，祇有用黃金和美鈔來彌補，這兩種東西將來大有用途。

第二，農產品的價格容易波動，因為工業國總用農產品的農產品，所以有「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口號。美國是工業國家，同時也是農業國，有許多東西不一定需要中國貨，而某些場合，中國却非用美國東西不可。例如機器、鋼軌、通訊器材、汽油、電器材料等等，自己不會做。你說我們有棉，美國有更好的，長纖維的棉花。你說我中國有麥，美國也有。桐油雖然不如中國的好，不過也種桐樹，而豬鬃，他們有人造豬鬃，所以他們不必定要用我們的。但我們若不用他們的東西，就不能工業化，例如宜昌水閘，需要一百四十一億美金，並聘請了薩凡奇博士。一種東西他要的時候，可以值四萬萬，他不要，就會殺價二萬萬，故外匯頭寸就短了二萬萬，又要用別的東西去彌補，就用金子和美鈔了，故將來金子和美鈔的用途很大，此時不要放手。現在錢莊收買美鈔，硬分幾等，第一等為新票和連號，價格最高，頂舊的票價格最小。其實，美國也用舊票，而且見了新票反而不信，防是假票，見了連號，就知道你是通貨膨脹了，在美國需要用的時候恐怕還是舊票好。

第三我以為在今後的五十年內，外匯管制不會取消，不但現在的政府如此，即如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新人上台，外匯管制也不會取消。你們可知道，美國和中國的情形相反，美國生產太大，消費不足，所謂消費不足的經濟學，獎勵快快用。中國生產不夠，不能鼓勵消費，倘使有人說：「快快用」，真是發瘋！現在人民窮苦之極，要消費，沒有東西可以消費；要節

省，也沒有東西可以節省。農民連糞也節省了，一根草也節省了，還能夠節省什麼呢？只有有錢的能夠節省。發國難財，接收財，勝利財的都有錢，這班人若是把他們的錢拿到外國去換生產品，去換機器、鋼軌、車頭、電氣器材，那末中國就能工業化。怎樣才能辦到呢？外匯必須照舊管制，不准有錢的人用錢向外國購買奢侈品與消費品，因此聯合政府成立之後，仍舊要管制外匯，否則資金就會逃到外國去買各種奢侈品，如無線電、新式冰箱，或是買很漂亮的活動房屋。外匯既然管制，因此需要黃金和美鈔，金子一定漲價。外匯管制需要實力，沒有力量如何管制？譬如一個人有一担米或是兩担米，而我有一萬担米，當然由我來定價錢。現在中央銀行出四百八十萬收金子，以前他六七百萬賣出，一出一入，賺得很多。金子在他手上有什麼辦法呢？希望諸位不要把金子美鈔拿出來，等新政府成立以後再拿出來，因為現在拿出來，換來的就是軍火，內戰不止，殺人盈野，一切犧牲全歸人民負擔，而坐享其成者祇是四大家族。千萬不要做傻子！等到和平到來，才拿出來，去換生產器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準。

第四，有了外匯可以買黃金，有了黃金可以買外匯，兩者是互通的，不過有點分別，黃金買外匯容易，外匯買黃金不容易。黃金集中在美國，美國人把黃金賣給政府，但是用鈔票向政府買回黃金，不給。如果中國的局勢將來有了改變，利用外資建設，例如宜昌水閘，定期九年完工，每年完成九分之一，假如到了第六年，他忽然不借了，成功了一半，死不死，活不活。從前德國就吃過虧，希特勒上台之前，一九二三年起，美國借款給德國幫助建設，到了一九二九年，忽然不借，德國的工程都已動工，豈能半途停工，故德國沒

法，只能統制。你不來，我自己設法，我有外匯。因此外匯一定要管制，那時候黃金美鈔就有大用了。

第五，英美有短期資金流通，例如美國利率百分之三，英國百分之四，那末資金就流向英國去，反之亦然。流來流去，可以活動，可以借。中國不與；中國按月十五分，美國按年只有三分四分，以利害，豈有不來之理？不過跑了進來，跑不出去了，豈不糟糕！英國存金少，稍稍提高利率，美國資金就會流來，中國雖然很高，但不安全，美國資金決不會來。因為我們不能利用英美的游資，所以需要先有準備金，故黃金和美鈔不能隨便消耗掉。

第六，中國一年到頭總有事，民國以來到如今沒有過休息，真正的民主政府在短期內難得成立，政治經濟上一有問題，游資就要逃走，近的逃香港，遠的逃美國。中國既不安全，外匯又不管制，資金容易逃走，故黃金美鈔，將來一定奇貨可居。

第七，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美國曾經發生經濟恐慌，預料這次的恐慌更大，一九二九年美國生產八百億美元，戰後已增至一千四百億，生產力更大，恐慌自然更大。所謂「富足中有匱乏」，在美國已成爲一種俗語。上次恐慌中的「麵包線」——大家排了隊換麵包，像中央銀行兌金子一樣，有股票債券的，因公司關門，有什麼用？有地產也不能出賣，不能換飯吃。在恐慌中，生產過剩，購買力弱，中國的絲茶就不能出去，市價也要跌，中國也跟着美國起恐慌。不但如此，美國因生產過剩，他的東西要對中國來傾銷。中國受兩層壓力，一面出口貿易減少，一面進口貨物增加，外匯頭寸勢必虧短甚鉅。所以當局要先預備，這種時候恐怕不遠了。雖然我們不能硬叫絲茶出口，但對進口貨物不能沒有辦法使之不進來；外貨不進來，外匯壓力就減輕了許多。現在滿街美國貨真不像樣，即聯合政府上台，也不免受外國恐慌的影響，故黃金美鈔不要放走，將來的需要很大。如果現在交出黃金美鈔，就換軍火進口；軍火進口不要緊，還要殺人。如果愛國，不要拿出來，他的法幣，不是他拿出來，是機器軋出來，他印出來的，你不要拿出來換法幣，傻瓜，爲了自己爲了個政府，又真正能爲大多數老百姓造福，那時再拿出來亦不算晚。

(上接十五頁) 那一點的垂直線上，雞蛋便應當直立起來。若是重心不在那條垂直線上，地球對雞蛋的吸引力便使雞蛋倒下來，使它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裏，就是說，使它橫躺下去。

去年我在重慶，有一位曾經在德國學電學的我國科學家把雞蛋直立這件事用科學方法加以分析，做了好些實驗。他把口紅塗在雞蛋上面，因而證明雞蛋和平面相接觸的地方並不是一點，而是一個最小等於兩平方厘米的面積。至於爲甚麼有人說雞蛋在立春日比較容易站起來，這位科學家是解釋的這模樣：他說冬天的時候，雞蛋裏頭的東西可能縮小，站雞蛋的時候，蛋內上部可能有一個大一點的空的地方，這樣使重心往下移，使雞蛋比較容易站住。他說也可能雞在冬天所吃的東西和夏天不同，使冬天的雞蛋比較容易站起來。不過那時候在重慶有人把空的雞蛋殼也站起來。也有人把煮熟的雞蛋也站起來了。有人把電汀泡也站起來。上面提過，作者個人在過去一年內站過好多次雞蛋，也不覺得冬天比夏天容易站些。真要解決這個問題，得有人肯花許多工夫，每年每星期都用兩小時的時間試把雞蛋站起來，站成功幾個都紀錄下來。這樣做了四五年之後，才可以決定到底是不是每年有一個時候雞蛋最容易站起來。

站雞蛋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去年初重慶人士對站雞蛋的熱狂被外國記者稱爲「A burst of sheep mentality」(直譯爲純粹小事情的爆發，意思是把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鬧得滿城風雨)。不過這件事使許多人得到了同一個感想，就是從前以爲不可能或者很難的事，現在被發現爲可能的，不怎麼難的。世上許多其他被人認爲不可能或者很難的事，都值得耐心地試一下，已經試過的不妨再試一下，也許我們要發現那些事都是可能的，都是不太難的。

今年立春日又來了。各地人士又在站雞蛋了。還沒有做過這個好玩的遊戲的讀者可以乘機會試一下。今日我國和全世界都有許多還沒有解決的問題。這個時代需要多幾個哥倫布出來，想出幾個新的方法來解決一切困難的問題。假使有人認爲所提出的方法太難了，或者簡直不可能的。可以把這個雞蛋直立的方法告訴給他們聽，問他們「那些你們認爲不可能或很難的

事你們試過沒有？試了幾次？試了多久？」耐心地多試一下也許我們要發現許多事情原來是可能的，而且是並不太難的。

### 編輯後記

第二卷第一期實印八千份，發行情形良好。本市有幾家書店都來增批。本社南京辦事處來函要求再寄五百冊，但已無以應命，祇送了四百冊去。現在社中祇存了一百多冊，這個餘數必須留作分寄定戶之用。將來要出合訂本時，祇好另行再版了。這地的發行反應不詳，我們仍憂慮因爲售價的增加，可能影響銷數。定戶繼續增加中，已超過三千四百號。

讀者一致要求增開「觀察一週」(即時事短評)，我們非常爲難苦痛。我們爲補救這種缺憾起見，希望多刊一點分析時事的文章。本期編者的一篇，實是爲了這種要求寫的。這不能算是一篇專論，但爲易於伸縮起見，仍編入專論欄中，不另設欄。吳世昌先生將幫助編者，分擔這一部分責任。

戴文襄先生在本刊第一卷中所寫的幾篇科學文字，廣博讀者好評。戴先生具有文藝素養，所以他的科學文字，不僅娓娓動人，而且另具風采。他還有幾篇歷在編者的抽屜裏，將陸續刊出。

李真白先生的數字，寫得很，據作者說，都是根據當時的日記寫的，都是事實。不知讀者讀之是否神往！他那令人神往的文字還多，且請讀者耐心等著，莫心急望一口氣吞完。

從這一期起，我們每期增加漫畫一頁。這還是嘗試性質，但我們希望能繼續保持一下。



的觀客·的立獨  
·的派黨超·

# 見觀察

版出六期星逢  
·期脫未從·

## 徵求直接定戶

一次先付國幣二萬元

## 直接定閱較零購迅速

本刊直接定戶，一律提前於星期五一點清付郵，絕無延擱遺漏之慮。

## 直接定閱較零購省事

每期按時由郵政遞到，讀者無須時時記星，外出購買。

## 直接定閱較零購合算

一律照每期定價八折優待。遠地書店，大都加成出售，直接定閱，合算得多。

**定閱注意**

- (1) 註明起寄期數
- (2) 註明寄遞方法

中宣部第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本刊增設

### 文化服務小廣告

- 一、本刊增設此種小廣告，純爲服務性質，使本刊讀者因本刊之傳佈，得交換達到其需要。
- 二、廣告內容以關於書籍、雜誌、報紙、地圖、儀器、樂器、文具、攝影機、自行車、書畫、郵票、照片等之徵求、出讓、交換，以及學校教員或家庭教師之徵求及徵職爲限。
- 三、照本刊實在成本，每一個字收費一百五十元，如係英文，每兩個字母作一個字計算。
- 四、讀者惠刊廣告時，字跡務須端正，將刊登速同廣告稿一併寄下，刊費可用郵票代理。(定戶請勿要求在定費內扣除，藉省手續。)
- 五、廣告上請註明刊登人之地址姓名，以便他人復信，本社恕不代爲轉信。
- 六、本社收到後，當依次刊出，不另給收據。惠件時，請於信封上角註明「小廣告」三字。

## 第一卷合訂本

上冊(一至十二期)  
下冊(十三至廿四期)

每冊售一萬二千元

掛號每冊加三百五十元

航掛每冊加三千五百元

◎存書不多◎欲購從速◎